

以杜月笙上款作品为例试论上款人对书画市场 价格的影响

王纯子

南京艺术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13

摘要： 书画作品在交易过程中存在的经济价值往往以货币的形式体现。书画作品作为一种特殊商品，在具有一定经济价值的同时，还存在着价值不确定性、价值潜在性，影响书画价值的因素也十分复杂。从微观层面出发，能够影响书画作品价值的因素包括了作品的真伪、精糙以及稀有度等与品质相关的要素。而“上款”作为传统书画创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是通过上款人自身的影响力或与创作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影响书画作品最初的创作和生产，同时为创作者提供着构思上的引导。因此在书画作品进入流转交易的过程中，上款人的身份能够起到反向参与作品的真伪评估及其精糙度、稀有度的度量，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作品品质评估辅助。2019年小雅斋“海上教父丹青情缘”杜月笙同一上款专场在杜月笙的人物效应下创造了多件历史最高价作品，这些拍品作为上款影响作品市场价值评估和市场价格获得的实例令“上款”这一书画中的重要元素得以强调和重视，通过梳理杜月笙的交往可反推这批作品的真伪和精糙、稀缺上的可能，在上款人的加持下，书画作品的市场价格最终得到相应的评估和确认。

关键词： 书画；上款；市场价格；杜月笙

中图分类号： G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码： 2023050105

Taking Du Yuesheng's Works as an Example, Try to Discuss the Influence of the Payers on the Market Price of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Wang Chunzi

Nanjing University of the Arts, Nanjing, Jiangsu 210013

Abstract : The economic value of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works in the transaction process is often reflected in the form of currency. As a special commodity,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works have certain economic value, but also have value uncertainty and value potential, and the factors affecting the value of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are also very complex. From the micro level, the factors that can affect the value of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include the elements related to quality such as the authenticity, roughness and rarity of the work.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creation of traditional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painting" mainly affects the initial creation and production of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works through the influence of the artist himself 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rtist and the creator, and at the same time provides creative guidance for the creator. Therefore, in the process of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works entering the circulation and transaction, the identity of the payer can play a reverse role in the authenticity assessment of the works and the measurement of the precision and roughness and rarity, which can assist the quality assessment of the works to a certain extent. In 2019, the "Sea Godfather Danqing Love" Du Yuesheng's special exhibition created many works with the highest price in histor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Du Yuesheng's character. As an example of the influence of the works' market value evaluation and market price acquisition, the important elements in th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were emphasized and paid attention to. By combing Du Yuesheng's communication, the authenticity and the possibility of fine roughness and scarcity of this batch of works can be deduced. With the blessing of the above person, the market price of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works will finally be evaluated and confirmed accordingly.

Key words :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payment; market price; Du Yuesheng

“艺术无价”是人们对艺术品价值的最高评价，但是自艺术品以一种商品形式走入市场后，价格也成了一种衡量艺术品价值的直接体现，其价格定位也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在艺术品交易市场上，书画占据大部分份额，作为一种特殊“商品”，书

画作品在市场价值的实现、市场价格获得上仍然存在着一些客观规律。佳士得前部门总监、美国艺术品交易商协会主席迈克尔·芬德利谈道，如果想要准确估算一件艺术品的市场价格，必须熟知并权衡下列五个属性：“出处”“状况”“真伪”“公开度”“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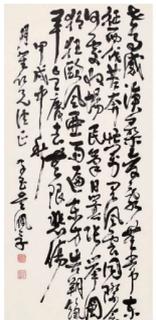
质”。除了宏观原因，作品自身的真伪、精髓以及稀缺程度等一切可称之为作品质量的微观因素都会影响到作品市场价格的获得。如何通过这微观因素对书画作品的经济价值进行评估和界定也越来越受到艺术品交易市场与各书画收藏家的关注。

在中国书画中，书画同源同体，题款是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件书画的价值很多时候便藏在款识当中。而“上款”作为作品的重要信息，它不仅与其他题记信息一同完成作品创作原因、背景的记录，甚至还是一种见证某些历史场景或事件的存在，这些功能为流转中的作品起到“加持”作用，使对应的作品更加可靠、稀缺，最终影响书画作品市场价格的获得。关于上款对作品市场价值的影响，张珩在《怎样鉴定书画》一书中提到一个事例，故宫博物院所藏宋人《九歌图》^[2]（故宫博物院目前将此画归至元代），在流转过程中被好事之徒将题跋部分割下，拼接成李伯时苏子由作的“款”见（图1），“上款”苏子由即苏辙。尽管在艺术价值层面出发，这样的一种改款手段对此画的价值影响并不大，^[3]但从市场偏好层面来看，此类“上款”是有增值作用的。

以下图作品为例，包含图2、图3、图4、图5等作品在内的二十余件杜月笙上款作品曾由笔者经手，后上拍于2019年小雅斋秋拍“海上教父”专场，该场拍卖中，吴佩孚的草书立轴（图2）以1414500RMB成交，章炳麟的篆书十二言联（图3）以4140000成交，于右任五言联（图4）以5635000成交，张人杰（图5）以2127500成交。通过雅昌拍卖数据^[4]可以十分直观地看出，2019年杜月笙上款专场中的吴佩孚、章太炎、张人杰等人作品以极大差距刷新了当年的相应书画作品的拍卖纪录并保持至今，于右任更是创造了其对联作品拍卖最高价，也是至今未有更高价格的对联拍品出现。



>图1 《九歌图》局部，图来自北京故宫博物院官网，文物号：新00121183



>图2

以上图片由小雅斋拍摄



>图3



>图4

事实上，通过对“海上教父丹青情缘”专场全26件作品检索发现，这种远超市场同类拍品中位数价格数倍，甚至是数十倍的断崖式价格差距现象不仅存在于以上提到的几件作品中，整个专场的大部分作品都存在这一现象。专场中，于右任、章炳麟等人作品在市场是相应稳定的、主流的；而吴天翁、徐涵、汪恂等所代表的另一种类型的非主流作品，相较而言吴天翁、徐涵、汪恂等人的作品特点表现为拍品数量少，价格偏低且不成体系，如吴天翁过往上拍作品数据雅昌上仅见4条（见图6），并且无论成交价及估价均不超过2w；汪恂（民国）拍卖记录仅有二十余件，除去杜月笙上款的这件对联，其余作品成交价及估价只有几千上下。但是在“海上教父”杜月笙上款这一专场中，吴天翁所绘的《杜月笙像》却能拍到17.25w，汪恂为杜月笙所作的七言联更是以36.8w成交（见图7），其他一些以往从未进入过市场的作者也获得良好的拍卖反应，如潘云致等，由此可见该专场杜月笙上款作品体现的特殊性。

因此，本文以2019年经手、经眼的杜氏门生后人旧藏杜月笙上款作品若干为例，从作品“上款”入手，分析“上款人”身份对作品市场价值的影响机制，探究“上款”是如何影响作品的价格获得的。

一、上款与藏品的真伪评估

艺术品收藏价值以及作品的真伪是绝大部分藏家最首要的关注点。只有保证作品可靠性，才能最大限度上保证作品的收藏价值。关于对书画作品真伪的判断具有多种途径。例如可以依靠鉴藏者的经验，通过考察作品的风格是否符合时代及作者个人特定阶段的风格，作品材质、装裱形制是否符合时代特性等途径进行



>图5，图片由小雅斋拍摄



>图6，左一为杜月笙上款作品，按成交价由高到底排列



>图7，左上第一件为汪恂，按成交价由高到底排列



>图8 张大千《瓜瓞绵绵》大风堂收藏，图采自《张大千九周年纪念书画集》

真伪评估。这种方式着重考察作品的“质”和“气”，并不涉及作品内容或文本。如若从作品的内容着手，题款信息则是文本释读的重要环节。基于受赠人与赠与者关系的可靠性以及赠与的可能性出发，在题款中，存在一个容易被忽略的部分，即“上款”。

“上款”这一形式由来已久，据刘九庵考证，其在南宋就已初见端倪^[5]（“上款”的出现，首见于南宋米友仁的《云山小幅》。该图除在画幅右上书“元晖戏作”的四字外，又在图上的另一接纸，也就今所谓的“诗塘”部位，书下这些文字“绍兴甲寅之夕前一日，自新昌泛舟来赴朝参，居临安七宝山戏作小卷，付与康收口”）。其作为款识的组成部分，作用在于表明赠与对象身份，同时也提示着作者与受赠者的关系。如图8，张大千1967年创作的《瓜瓞绵绵》中落款写道：“丁未元月初六日，雏孙绵绵满二周岁，予方队病仍悬灯庭树延宴亲友，更写瓜瓞图以授之……”；这件作品藏于大风堂，系张大千居于巴西八德园时期赠与其最爱的小孙女“绵绵”的泼彩作品。题款写明了上款人的称谓，观者从通过此信息便很快能确认上款人的身份，轻松地考证出上款人与创作者的关系，加上丰富的创作背景，以此确定这件作品的可靠性。换句话说即题款丰富的细节和明确的上款令未经历过的造假者难以作伪，并且由于作者与上款人的亲密关系，赠与行为合理，极大提升了作品为真的可能性，人际关系的可靠增加了作品的可靠性。因此，当一件作品的上款与创作者、作品出处与上款人的关系出现强相关的情况下，作品的可靠性则较高，相反，当上述要素出现明显矛盾时，作品的真伪则存疑。基于这一角度出发，“上款”作为作品鉴藏的切入点十分有效，能辅助鉴藏者展开真伪判断，进而对作品出市场价值评估。

类似的，“海上教父”专场26件作品作为拍卖反响较大的同一上款专场，“上款”杜月笙对作品市场价值获得有着明显的影响，其身份和交往为作品的可靠性提供着底层支撑，使得创作者与受赠者的赠与关系变得合理。

在杜月笙同意上款的这一专场中，作品创作者的身份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军政人物，如吴佩孚、汪兆铭（图9）、张人杰；二是文化名流，如吴昌硕（图10）、程砚秋（图11）等；三是政治文化均有作为的人物，如于右任、章炳麟等，基本符合杜氏人生中交往特点，其中不少人曾多次参与了杜月笙一生中的重要时刻。

基于杜月笙的人物背景层面展开分析，杜月笙，原名杜月生，后得章炳麟改名为“镛”，号“月笙”。20世纪20年代前后，



>图9



>图10



>图11

杜月笙在黄金荣林桂生的扶持下在上海声名鹊起。至20年代中后期，杜月笙风头一时盖过黄金荣，成为上海三大亨之一。据章君毅所撰的《杜月笙传》中所述，当时居于法租界的杜月笙，几乎包揽了政界军阀、社会名人的各种需求，上至军火贩运、政客避难收容和资助，下到社会名流社会事务的处理解决，杜月笙都能通过个人能量给予妥善解决。在这种广泛的人际关系网下，杜月笙游走于军政高层及文化翘楚之中，来往间推杯换盏，题赠书画，变得十分平常。1931年，杜氏祠堂落成，杜月笙迎来了其人生的高光时刻，蒋介石、段祺瑞、于右任、吴佩孚、章士钊等势要名人纷纷题赠匾额或祝词，章炳麟、汪精卫等更是以诸多溢美之词写下了《高桥杜氏祠堂记》。京朝名伶如梅兰芳、程砚秋、杨小楼等均为贺杜氏祠堂落成赴上海登台助兴。

以此作为叱咤上海滩的大佬，尽管杜月笙的人际交往或多或少带着功利，却也不乏真情实意。杜月笙出生于上海浦东农村，幼年失怙失恃，家贫失学，这使得他十分崇敬有学之士。杜月笙发迹后极力结交知识分子，早年与章士钊曾关系颇好，与文化巨擘章炳麟也是忘年之交，尽管彼此在某些见解和立场上有所差异，但章士钊和章炳麟等文化名士对杜氏的为人和魄力，无不表示赞叹，以至于在杜月笙声势大不如前时，仍对杜月笙致以极高评价，将杜月笙比作“蛟龙”。章士钊于杜氏六十秩时，执笔作寿序写：“长江自西北来……蛟龙潜藏其内，风雨孕育其中，而笃生人杰，盖无如杜公矣……^[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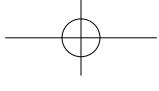
如果说，章炳麟赐名是见证杜月笙的“新生”，那么许世英1951年的“暖寿”则是见证了杜月笙的落幕。1951年杜月笙离开大陆已有两年，在其63岁生日将近时于香港病逝，许世英作为老友，痛哭流涕，寸步不离杜月笙遗体，于右任等国民党元老也纷纷发去唁电、送去挽联^[7]。

结合上文所述，杜月笙与于右任、章炳麟、汪兆铭、章士钊、程砚秋等人的关系令这些名流曾多次为杜氏提笔，并在杜氏的相关传记中均有多次提及，从而不难看出杜氏与众多社会名人的密切来往，因此在这种密切的交往关系的支撑下，相应作品的赠与可能性得到极大提高，于右任、章炳麟、汪兆铭、章士钊、程砚秋等人所作“月笙先生”“月笙仁兄”上款作品的存在变得合理，上款作品的可靠性得到提高，进而加持了作品的市场价值。

二、上款与作品的艺术性

在中国书画鉴藏中，“著录”常为鉴藏家竞相追逐，这种现象在拍卖行业更为明显，所有拍品信息中，著录信息和出版信息是一个必写项。买卖双方之所以热衷于此，总的来说是由于出版和著录的增值作用。增值路径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著录为作品来源提供依据，证明它的可靠性。二是说明某件作品自身的重要性，出版作品常作为作者某一阶段艺术成就的最高总结，对作者有着重要意义。因此，对于同一书画家来说，著录及出版过的作品的艺术水平往往要高于一般未被著录出版的作品，市场价格也会更高。

那么，在中国书画中，一件作品的艺术性表现在哪些方面



面呢？

东晋顾恺之曾以“传神写照”作为绘画艺术性表现的理想状态，主张“以形写神”^⑩。其认为绘画的最高境界在于人物描绘的“传神”，画家应当通过描绘人物的外在形象将其人物的精神内核、人物品格展现出来。在具体的操作上，谢赫又提出“气韵生动”“骨法用笔”“应物象形”“随类赋彩”“经营未知”“传移模写”的绘画法则。在这些法则中，十分容易区分出几对观念，即：“形”与“神”“华”与“实”“外在特征”与“内在品格”的对应，它们通过艺术家的艺术创造而得以完美统一。

而“海上教父”专场中的绘画作品也基本在此种传统绘画逻辑下进行。如图12，通过题款中的上款信息可知，这件人物系吴天翁所绘1931年为杜月笙所绘，由杜月笙老友许世英、马相伯题。画中吴天翁根据杜月笙本人特征及绘画中常见的无量寿佛形象进行再创作。画中，杜月笙化身无量寿佛，身披袈裟，面相清癯肃穆地盘坐于蒲团之上，其身后见数卷经卷，身前香炉青烟袅袅上升。其间，人物的衣纹线条疏密有致，颈部及群裾“骨法用笔”，以连绵线条勾勒，与红色袈裟形成对比的同时让人物面部表情得以凸显。吴天翁为杜氏所绘的这幅作品，在其所有的上额拍作品中可以算是水平最高之作，较于面世的其他作品，如2007年12月上海泓盛秋拍的《川上抚琴》（作于1934年）（见图13），这件杜月笙上款作品舍弃了背景而专注于人物描绘，画面构思独特精巧，人物描绘细致且传神，杜月笙柔肠侠骨的“慈悲像”与帮会大佬狠戾的“众生相”被完美体现出来，完成了人物“形”与“真”“华”与“实”的多面统一。

《杜月笙像》创作于1931年，《川上抚琴》创作作于1934年，前后仅相差三年。在这短短的三年间同一作者的审美风格和艺术表现上有着明显不同，是什么原因导致的这种差异？

一般来讲，同作者相同时期的作品，绘画技法的差别并不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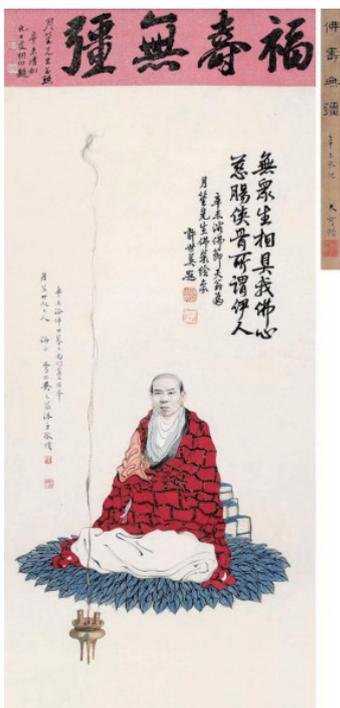
太大，但其作品与作品之间的精糙优劣受所投入的创作精力呈极大的相关，创作者对于一件作品完成后的用途考量会导致其精力分配的差别化，例如对于特殊赠与对象或上款对象，创作者会对上款人的偏好的反复琢磨、对上款人喜好所作的内容的构思，创作时对作品内容质量也秉持着高要求。这些所有的投入最终不仅造就了精品和一般作品的差别，还直接造成了对应作品市场价格的差别。结合人物与时代背景，《杜月笙像》绘制于1931年农历四月初八浴佛节，或于该日题赠杜月笙。这一年，上款人杜月笙势力如日中天，上海滩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是名副其实的“上海皇帝”。吴天翁这件杜月笙佛装像，在绘制时别出心裁，以不同其他同时期的艺术手法，将这位海上大亨复杂而立体的性格展现的淋漓尽致，可谓是其尽心之作，在拍卖中也以数倍的价格超越以往上拍作品。

三、上款与作品的稀缺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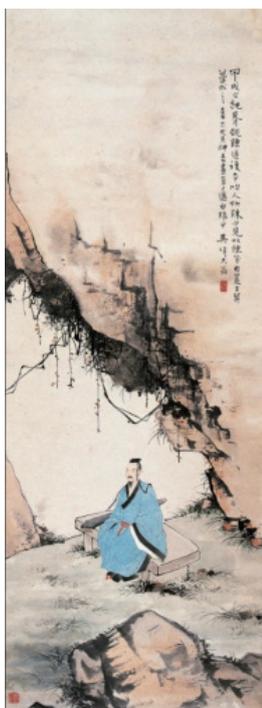
“不管是在一级市场还是二级市场出售，决定艺术品价格的都是供给、需求以及营销^⑪。”在保证其为真迹和其艺术水平的前提下，越是稀缺的艺术作品其价格也将会越高。那么，一件作品的稀缺来源何处呢？

在微观经济学中，商品价格的差异被认为是源自商品的差异性，这种差异势必导致相对于众多同类商品而言，某件商品“一般”和“特殊”“普遍”和“稀缺”的区别。而杜月笙上款作品具有的稀缺性则主要是由于人物传奇性所造就的，杜月笙作为20世纪20、30年代的上海滩风云人物，其出身却十分卑微。1988年，杜月笙出生于上海浦东农村，其父杜文卿曾做过茶馆跑堂、码头丁役。在杜月笙出生后的五年中，其父母相继去世，杜月笙便与其继母相依为命。1895年，继母张氏失踪，自此，杜月笙开始了其孤苦无依的流浪生涯，其间混迹于赌场、码头间，直至1918年拜入黄金荣门下，才算安定下来。黄门下的杜月笙凭借其头脑和勇气，为黄金荣及林桂生夫妇贩运烟土，笼络帮派势力，制造极大收益而开启了他后日的大亨之路。“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五尺天”，确如黎元洪秘书饶汉祥所言，发达后的杜月笙交游广泛，触手伸及政、经、文等多个领域，心狠手辣的同时又显仁慈，既干着贩运烟土、绞杀义士的勾当，但又有抗日救灾、赈济灾民的义举，其人生种种复杂而多面。纵观杜月笙的发展轨迹，可谓是突破了个体一般发展结果而成为无法复制的特殊个例，这种巨大的割裂与差异，令他人感到惊叹，人人称奇而传之，成为时代传奇。传奇必然是个例，是独特的和稀少的，杜月笙的特殊经历造就了与其相关事物的稀有。“海上教父丹青情缘”的专场作品也因此而变得独一无二，凭借这种“稀有”的特质，该专场同一上款的多件作品获得了极好的拍卖价格。

以于右任为例，其目前在的拍卖数据就有25000余条。在如此巨大的拍卖数据下，杜月笙上款的五言联（见图4）却能成为于右任所有上拍对联中的最高价作品并连续四年保持至今，与杜月笙的人物身份密切相关。“挥觞道平素，抚剑独自行”“月笙仁兄正，于右任”。这对五言联内容均出自陶渊明，陶渊明在《咏二



>图12 吴天翁《杜月笙小象》



>图13，图来自雅昌拍卖子网站



疏》中写：“促席延故老，挥觞道平素”，又于《拟古·其八》中有“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之句。陶渊明早年入仕，坎坷曲折，愤然归隐田园。

与陶渊明的历程有相似之处，杜月笙在历经种种后，淡然隐退香港。少年时期，杜氏独自闯荡，发迹后意气风发，参与政治，各路英雄豪杰，无不把酒言欢。杜月笙前后组织、策划了许多影响甚大的事件，对国民党也是忠心耿耿，特别是对蒋介石，杜月笙可谓是鞍前马后，但其最终也未获一官半职（实职），在政治生涯上可谓失意的。1949年，杜月笙迁居香港，对于关于往事种种也就淡忘了。“挥觞道平素，抚剑独行游”结合杜氏生平轨迹，于右任借陶潜诗中此二句写赠杜月笙颇为神妙。

内容的与人物内涵的契合令这件的独特性发挥到极致，在内容与人物精神的联结下，陶渊明的部分品质、经历与杜月笙发生关联，这种关联中一方面反映着上款人的行事风格、人物气质，另一方面也在表明他者目光对杜月笙的评价。因此，这副五言联不仅是一件特殊个例精心创作的作品，还是一件特殊文本的存在，记录着这位上海皇帝的某些特征。可以说，在于右任数量众多的书法作品中，这类特殊创作十分难得，加之行笔如此雄健，内容如此豪迈的盛年力作极为稀有，使其成为对联品类拍卖价格之最。

结语：

总的来说，书画作品的市场价格的获得，基于微观层面，与其自身的真伪、精糙、稀有等因素相关，上款作为传统书画的重要行书或组成部分，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辅助或完成对这些要素的评估、判定。在作品的真伪上，作为可作品品质评估的切入点途径，其通过提示受赠人与赠与者关系来表明赠与的可能性，进而说明某件上款作品的可靠性；在精糙和稀有方面，上款作品的内容与上款人精神气质、人物性格的契合性表明了创作者创作的精力投入程度，以及确立一件作品不同于作者应酬之作或一般作品的独特性，这些因素最终加持作品价值，令其在拍卖市场上获得良好的价格体现。

“海上教父丹青情缘”杜月笙同一上款专场作为近年反响较大的同一上款专场很好的说明了上款对书画作品的价格影响。在这一专场中，作品在上款人杜月笙身份和人生经历的特殊性加持下，获得了对以上因素的相应确认，并以这种确认下将上款作品区别于市场同类拍品，在真伪、精糙、稀有度得到确认的基础上对作品产生一定程度的增值，进而最终影响该专场拍品最终市场价格的获得。

说明：

1. 本文拍卖数据均来自雅昌艺术网（艺搜）。
2. 本文图片均已标明来源，除网站、书籍插图外，其余均来自小雅斋实物拍摄，已取得图片使用权。
3. “海上丹青”杜月笙上款专场均为笔者本人经手藏品。

参考文献：

- [1] 《艺术的价值：金钱、社会、美》，[英] 迈克尔·芬德利 / 著，王凝新邓峰 / 译，中信出版集团，2021。
- [2] 故宫博物院目前将此画归至元代
- [3] 张珩，《怎样鉴定书画》，浙江人民出版社，2015年5月，p45.
- [4] 见刘九庵：《古书画的“上款”与书画鉴定》，美术观察，1996：“上款”的出现，首见于南宋米友仁的《云山小幅》。该图除在画幅右上书“元晖戏作”的四字外，又在图上的另一接纸，也就今所谓的“诗塘”部位，写下这些文字“绍兴甲寅之夕前一日，自新昌泛舟赴朝参，居临安七宝山戏作小卷，付与康收口”。
- [5] 章士钊于杜氏六十秩时，执笔作寿序写：“长江自西北来……蛟龙潜藏其内，风雨孕育其中，而笃生人杰，盖无如杜公矣……”见（章君毅，《杜月笙传·下》，p1045，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10.
- [6] 章君毅，《杜月笙传》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10.
- [7] 葛路《中国画论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p30.
- [8] 《艺术的价值：金钱、社会、美》，[英] 迈克尔·芬德利 / 著，王凝新邓峰 / 译，中信出版集团，2021.